

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博弈：《书店》中的权力、知识与抗争

黄春兰

桂林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广西桂林，541800；

摘要：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作为 20 世纪英国文坛大器晚成的新锐作家代表，曾被《泰晤士报》列入“自 1945 年以来的 50 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小说《书店》（The Bookshop）讲述了一位寡居老妪在经营书店过程中遭遇上流社会权势阻挠，最终被迫关店的故事，深度展现了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间的多维博弈，揭示个体在权力网络中的困境。本文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剖析作品中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社会阶层的冲突以及主人公弗萝伦丝的抗争历程，进一步探讨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及其对个体命运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书店》；文化资本；社会阶层；权力与抗争

DOI:10.69979/3041-0673.25.05.044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1916—2000）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闻名于世，她的小说《书店》不仅展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还深刻揭示了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菲兹杰拉德在英美文坛享有盛名，获奖颇多，但国内外对她的研究热度和深度仍有不足，且多集中在女性主义或人物形象分析，而有部分仅是对作者和作品的简单介绍与赏析。因此，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角度重新解读《书店》，不但利于丰富对该作品的理解，还能为探讨社会阶层与文化资本的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

文化资本理论由当代著名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用来分析文化资源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具身化的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指人从社会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品格和性情，包含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储存在具体物件中的客体化的文化资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如名贵的画作、书稿都因为凝结了文化资本而有价值；制度化的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即支配社会运行的规则、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或行为模式。”^{[4]83} 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本形式在社会中被不同阶层所掌握，并通过教育和社会交往等方式进行传递与再生产。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不仅是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亦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上层阶级能通过垄断文化资本来维持其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底层阶级则因缺乏文化资本难以实现阶层流动。

在文学研究中，文化资本理论是分析文学作品中的

社会关系和人物命运的有力工具。通过将文化资本理论应用于《书店》，可以更加深入探讨小说中文化资本的体现、社会阶层的冲突以及个体的抗争过程。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揭示小说的深层主题，还能为理解文化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提供具体的文学案例，并拓展文化资本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本研究旨在通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书店》中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博弈关系，探讨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及其对个体命运的深远影响。

1 文化资本的具象化与小镇的碰撞

弗萝伦丝的书店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创业尝试，也是文化资本的具象化体现。书店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载体，承载着书籍、知识与文化活动的传播功能。弗萝伦丝希望通过书店引入文化资本，提升小镇的文化氛围，但她的这一尝试却遭到了小镇居民的冷漠与排斥。在第一章，菲氏对哈堡镇的描绘如下：“小镇本身是位于大海与河流之间的一座岛屿，一旦它感到麻烦，便会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把自己封闭起来”^{[2]7}。小镇居民的保守态度犹如小镇的地理环境一样闭塞，他们封闭自己，不愿接受新事物。

弗萝伦丝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使之成为具身化文化资本的承载者。她期望通过书店来传播知识，但小镇居民对文化资本的排斥体现了文化资本在小镇中的传播障碍。这种障碍不仅体现在居民对书店的不理解上，也体现在小镇对文化认证的忽视中。他们将自己的内心封闭在孤岛之上，不愿也不屑去接受新事物。他们没有与和炸薯条，也没有自助洗衣店，并且还缺乏娱乐活动，

“除了每隔一个礼拜六晚上放映一次外，也没有电影可看”^{[2]2}，可即便他们对这些有想法，也没有人做出任何改变。因此，开书店的想法在小镇传开后，居民们几乎都表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认为“开一家书店是天方夜谭”，包括负责审核借贷的银行经理凯布尔先生也是不看好此事。“在哈堡，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营运，而开一家店铺的念头，就像吹到遥远的内陆的一丝海风，软弱无力地撩动着银行迟滞的空气。”^{[2]3}那吹到遥远内陆的柔弱海风其实也是势单力薄的弗萝伦丝的个人写照——一个独居老妪试图通过开书店证明自己，却只能惨淡收场。

在弗萝伦丝打算将闲置的老屋改造成书店之前，小镇居民并没有在意它，总被人遗忘。老屋象征着被忽视的文化潜力，而弗萝伦丝老屋改造书店的行为正是将这种潜力转化为客体化的文化资本。作为小镇的权威人物，加玛特夫人对弗萝伦丝经营书店的打算表现出极大的敌意。她的反对并不单单针对书店这一商业行为，归根结底是弗萝伦丝试图引入的文化资本对小镇现有社会秩序的一种潜在冲击。书店的出现不单是商业空间的改变，更是文化资本的引入，它是对加玛特夫人所代表的上层阶级对文化资本垄断的一种挑衅。加玛特夫人通过经济和权力手段对新书店进行打压，试图维持小镇的文化封闭性与社会阶层的固化。

书店开业初期，小镇居民对此给予了关注并偶尔光顾，似乎书店已融入小镇生活中，但这种表面的接纳掩盖了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加玛特夫人的侄子在权力网络操控下施行的《征用具有教育价值以及利益的住宅议案》，营造看似合理的表象，本质上是对文化资本的抢夺与控制。最终，弗萝伦丝的书店事业被迫终止，黯然离开小镇。她的失败不单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文化资本在小镇中被压制的象征。老屋书店的倒闭和弗萝伦丝的离开揭露了文化资本在小镇社会中的传播阻碍，以及社会阶层固化下对个体努力的残酷压制。整个事件生动地呈现了文化资本与小镇社会结构间的激烈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对个体命运和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

2 文化资本的垄断与阶层的较量

在《书店》中，维奥莱特·加玛特夫人为小镇一切事务提供资助，依仗其经济资本与社会关系网垄断了文化资本的分配。老屋书店的计划传到加玛特夫人的耳朵里，她开始留意先前从无往来的孀居村民弗萝伦丝，并

邀请她参加自己的酒会。在酒会上加玛特夫人暗示弗萝伦丝放弃开书店，并建议将老屋改造成艺术中心，即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社区——人们聚集到同一个公共空间内，通过共同关注或从事的文化活动形成互动，建立认知与情感方面的联系，从而编织新的人际关系网络。”^{[3]13}“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基本逻辑是权力、资本与地方的博弈”^{[3]12}，所以这一提议不单是对弗萝伦丝书店的直接打压，更是对文化资本控制权的抢夺。加玛特夫人的权力网络与文化资本的结合，使她毫无争议地成为小镇上的权威。

弗萝伦丝开设书店的行为之于加玛特夫人文化资本垄断是一种直接挑战，可她的努力却与小镇保守文化产生激烈冲突。在英国文化中，鳗鱼喻指圆滑、难以捉摸的人，这体现了文化资本在语言和隐喻中的传递与积累。作者巧妙地运用该隐喻，将鳗鱼的特性与弗萝伦丝的境遇关联起来。弗萝伦丝在面对加玛特夫人等权势者时，尽力表现出“既明智又圆滑”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自身处境的适应，更是她尝试运用积累文化资本来提升自身地位的一种努力。捕食的鹭鸟象征以加玛特夫人为首的权贵，他们凭借自身的经济资本与社会地位来分配与垄断文化资本。而弗萝伦丝，犹如那条拼命挣脱却终将葬身鸟腹的鳗鱼，体现了出底层阶级在权豪之下的举步维艰。这种隐喻形象地呈现了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中的不均衡分配，以及底层民众在争取文化资本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观察，弗萝伦丝的“圆滑”并非是一种普通的性格特征，实则是她尝试进行积累文化资本的一种手段。她凭借观察、模仿与适应，试图在小镇的社会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以加玛特夫人为首的权势人物却通过权力与经济资本的垄断，阻碍了弗萝伦丝对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积累。这种权力与文化资本的强强联合，促使弗萝伦丝这样的底层群体在社会阶层的争斗中处于劣势。

不仅如此，菲兹杰拉德还揭示了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文化资本不单单是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更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弗萝伦丝的抗争是对权力和文化资本垄断的直接挑战，但她的失败也表明了文化资本在权力面前的不堪一击，以及社会阶层固化对个体努力的残酷压制。

3 权力的阴影与知识的抗争

加玛特夫人的权力网络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全面控制，是小说中权力的多维运作的体现。“个人对文化资本的拥有还可以某种形式转换为提升其地位的社会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1]95}。她对文化资本的压制，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弗萝伦丝的书店，展现了权力对文化资本的绝对控制。弗萝伦丝通过书店传播知识的努力，却遭到了小镇居民的拒绝。这种拒绝不仅是对知识的拒绝，更是对文化资本传播的阻碍。书籍与教育在小说中成为知识的象征，但它们在小镇上却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在环境描写上，佩内洛普多次添加了非自然实体“敲门鬼”的描述。“在哈堡，敲打搞恶的鬼唤作敲门鬼。它们可能经年累月地作弄人，……好像无论隐藏在它身后的是什么，都无法逃脱。”^{[3]13}“一股充满敌意的力量，顶着她的推力，来回牵扯，总是在她前头一点点，带着疯子一般的厉害劲道。”“听起来不像是一样东西在敲击另一样东西，……好似一只手在为一幕滑稽的场景鼓掌，而她朝里跌了进去，膝盖跪在砖头地面上。”^{[3]35}“窗子上嘭嘭的撞击声死寂下去，变成嘶嘶声，然后又聚集力量，越来越响，转成动物的尖声长啸，一遍又一遍。”^{[3]74}超自然物“敲门鬼”的登场使得整篇小说多了一丝神秘色彩，事实上这股神秘力量隐喻的是以加玛特将军一家为首的名流组成的权力网络，这张网无形无状，却存在每一个人心中，就如“敲门鬼”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给小镇居民施加压力和恐惧。假如有人试图挑战上流权势的权威地位，那么“敲门鬼”就会造访他，搅得他不得安生，这股力量便是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人群对于平民包括物资、精神和文化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的控制。

弗萝伦丝的抗争过程充满了对阶层固化的挑战。她拒绝加玛特夫人的提议，坚持开书店，但最终却败在权力与经济资本的压制之下。尽管弗萝伦丝的抗争以失败告终，但她的努力却为个体对阶层固化的挑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书店》故事背景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为小说增添了更深层的意义。彼时的英国在二战结束后重整旗鼓持续进步，工业高度发达，

科学与技术发展迅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社会，战争、暴力、强权的阴影仍未散去，人们的生命仍然受到来自种种专制、歧视的威胁。启蒙时代以来建立起的“进步”信念和人性观，在民生多艰、社会不公的现实悲剧面前变得摇摇欲坠。”^{[5]34}弗萝伦丝和她的书店的命运，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缩影。

边缘弱势人群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丧失话语权，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菲兹杰拉德“立足于一名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照角度，在剖白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社会关系中冷漠、不公和邪恶一面的同时，对人性力量和人文精神始终抱有执着的信念和期待。”^{[5]34}在《书店》一书中，作者采用她一贯的叙事风格，将隐喻性的意象与哲理性、普世性和主体性的思考融合在一起，通过笔下塑造的人物传达出她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寥寥几笔便带有辛辣的讽刺和蕴含深厚的韵味。她呼吁世人重视少数弱势群体的声音和诉求，抵制强权政治，对抑制底层发声的行为进行谴责。

参考文献

- [1] 哈旭炯，从《文化资本》看美国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化之争[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01): 94-97.
- [2]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1978)，《书店》(The Bookshop) [M]，尹晓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 [3] 谢锡文，郭佳琦. 空间制造：文化社区、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基于“文学生活馆”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4): 12-18.
- [4] 徐好，围城与焦虑——文化资本视角下的《纯真年代》[J].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 2024(01): 82-86.
- [5] 朱晔祺(2014)，论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小说中边缘弱势人物的价值诉求[MA]，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大学。

作者简介：黄春兰(1995.3-)，女，壮族，广西南宁市，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